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隋唐五代

巴蜀书社

译注 武秀成 赵益

审阅 周勋初

隋书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隋书选译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范 勇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 图：罗二虎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隋 书 选 译

武秀成 赵 益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9.75 插页4 字数16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9,000 册

ISBN7—80523—358—6/Z·28 (第二批50种)

定价：140.00元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071022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人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在“二十四史”中，《隋书》是第一部成于史馆众家之手的史书。它是唐朝初年所设史馆修撰的六部“正史”之一。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秘书丞令狐德棻鉴于“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旧唐书·令狐德棻传》）的状况，向唐高祖建议编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书。次年，朝廷任命封德彝、颜师古等人主持修撰《隋书》，但历时数年，未能成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改组史馆，建立制度，重修五朝史。由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史馆）务”并主持《隋书》的修撰，参加编修的还有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中

书舍人许敬宗等当代大儒。到贞观十年（636），《隋书》及其它四朝史同时完成，当时合称“五代史”。其中，梁、陈、北齐三书都是由一人独力完成，《北周书》名义上是五人同修，但实际上是出于令狐德棻一人之手，只有《隋书》是成于众人之手。其序、论全由魏征撰写，纪、传则由颜师古等人撰成，司空房玄龄为总监。因由魏征主修，所以后代著录《隋书》，纪传部分的作者题“魏征等撰。”

当时的“五代史”还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敬播、符玺郎李延寿、秘书丞令狐德棻、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奉诏续修史志。到高宗显庆元年（656）完稿，历十六年，共成十志。因为“十志”。本为“五代史”而作，所以当时称为《五代史志》，与“五代史”各自单独流行。当《五代史志》与“五代史”合编时，因为隋是最后一朝，故附入《隋书》，因而又有了《隋志》之称。其中《天文》、《律历》、《五行》三志为李淳风一人独撰，《经籍志》由魏征、李延寿、敬播撰成，褚遂良则撰写了《五行志序》。因由监修人长孙无忌署名上表敬呈，所以后世著录《隋志》题“长孙无忌等撰”。其实，贞观十五年命诸臣修志时并无长孙无忌

之名，直到高宗永徽三年（652）无忌才受诏监修（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当时书稿已告垂成，长孙无忌作为撰者，可以说是有名无实。

《隋书》共有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三篇，合五卷；列传三百三十个，合五十卷；志十篇，合三十卷。人物类传共分十类，其传目是：诚节、孝义、循吏、酷吏、儒林、文学、隐逸、艺术、外戚、列女。十志篇目是：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

《隋书》的材料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隋朝的国史，指隋朝史官编修的实录、起居注等。今天可以考知的只有王胄的《开皇起居注》六十卷和《大业起居注》。二是已编纂成书的隋史。隋文帝禁止私家修史，故当时只有王劼撰成《隋书》八十卷。三是史官广泛搜罗野史、笔记、私家传状之类的材料。编纂《隋书》时，上距隋亡只有十一年，尤其是史馆中人员多曾在隋朝任职，对于隋朝的事迹、人物，都是耳闻目睹，故搜罗史料，访问耆旧，鉴别真伪，都有比较有利的条件，因而能够获得大批珍贵的史料。《旧唐书·孙思邈传》就介绍过这类情况：“魏征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以口传授，有如目睹。”这是《隋书》获取材料的有利条件。

虽然《隋书》没有前“四史”那样的盛誉，但在“二十四史”中，它的确可算是一部上乘之作。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评价说：“《隋书》最为简炼，盖当时作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陔余丛考》卷七）其实《隋书》的优点不仅是文字上简炼，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体例的严整和史家的卓识。《隋书》虽然是出自众人之手，但却很少有后世官修史书所常见的内容芜杂、互相抵牾、体例不一的毛病。它的体例继承了《史记》、《汉书》以来的优良传统，同时又作了更为科学的调整 and 安排。如列传方面，把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边少数民族分作四传叙述，条理比较清晰。又如把反隋人物杨玄感、李密等人放在诸臣之列，而没有把他们视为叛臣归入宇文化及、王世充之中，显示出史家的识见颇为明达。《隋书》“十志”也是继承《汉书》的精神而设置的（《汉志》之后，正史一般只有八志），但《隋志》又不泥于《汉志》。它舍弃了《汉书》的《郊祀》、《沟洫》二志，而从《后汉书》增设了《百官志》，这表现出志书的体例更为完整。

二、列传材料的珍贵。《隋书》列传，选取了各个阶层的人物，他们的事迹、活动，就是了解隋朝社会的窗口。在这些传记中，同时还存在着各个方面的珍贵资料，比如在李德林、牛弘、魏澹等传中，记载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情况；在《陈稜传》、《流求传》中，记载了台湾的社会状况以及和大陆的关系。又如《何稠传》中记载何稠制作的绿瓷琉璃、织金锦袍和木质六合城；《杨素传》中记载杨素监造的“五牙”战舰，高百余尺，能装下八百战士；《张胄玄传》记载有精密的天文推算；《耿询传》记载有水转浑天仪、马上刻漏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科技工艺史上的珍贵资料，

三、十志内容的丰富和精确。《隋志》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的范围有时概括了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材料非常丰富。如《食货志》，南北朝诸史只有《魏书》立有此志，所以《隋书·食货志》虽仅一卷，但史料却极为重要。它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北朝齐、周、隋三代所实行的均田制，也完全靠它记录了下来。《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郡县户口。《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

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而《律历》、《天文》二志，则对南北朝以来天文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历志》中。直到今天，这二志对研究天文气象学也还有参考价值。另外在《律历志》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这是研究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十志”中，尤为人所乐道的是《经籍志》。目录学创始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继起的有郑默的《中经》、李充的《四部目录》、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但它们都早已亡佚了。唐以前的目录书，仅存有《汉书·艺文志》，但又是以学派分类，而不是按文献的性质来分类。《隋书·经籍志》则把中国的文献典籍区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这种图书分类法，直到清代相沿未变。它不仅考辨书籍之存亡，还论述学术之源流，对自汉至隋六百年间的图书情况进行了一次较为科学的总结，给后来正史中的《艺文志》及目录学树立了很好的范例。南宋郑樵称赞说：“《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通志·艺文略》）此言不为

过誉。

《隋书》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它是成于众家之手，更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

《隋书》中有的列传表现了史官秉笔直书的高贵品质。如《虞世基传》，传主是唐太宗的当朝宠臣虞世南之兄，史官直书其恶，没有丝毫掩饰，可见其史笔之严。但有的地方却又采用“曲笔”，

“为尊者讳”。如隋炀帝伪造诏书，杀父夺位一事，在高祖、炀帝二纪中不泄一点消息，而且把高祖的死叙述得象自然死亡一样，只在《后妃·宣华夫人传》和《杨素传》中略露端倪，仍然没有直书其事。史官讳言此事，是因为他们的当朝天子唐太宗也是杀兄逼父而登基的。又如《李密传》，只叙述到他归唐封为邢国公，而对他入唐不久即被唐王朝诛杀一事讳莫如深。至于《房彦谦传》，更有阿谀奉承之嫌。传主房彦谦在隋朝本无事迹可记，为充篇幅，于是收入他的一篇长文。替他立传，只是因为他的儿子房玄龄为当朝宰相而且任《隋书》总监的缘故。

由于史官囿于封建统治者的观点，《隋书》对隋末农民起义领袖，除李密外，其它如窦建德、翟让、杜伏威、辅公祐等叱咤一时的人物均不立传，只略见于《炀帝纪》，幸有后来的新、旧《唐书》为

他们补了传，他们的事迹才不至于湮没。

在史料的裁剪与安排上，《隋书》也有不足之处。如《恭帝纪》，虽名为一卷，实则只有一千五百余字，史实极为简略，与高祖、炀帝二纪相比太不相称。在《百官志》中这个缺点更加突出。五朝官制，以北周最为繁杂，而且在中国古代官制史中迥然别为一个系统。《百官志》本当详加叙述，反而以寥寥数语带过，理由是北周官制“并具《卢传》”（指《周书·卢辩传》，不复重序云云。”其实《周书·卢辩传》中所载的也十分简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隋书》有的列传也写得较为乏味，最使人昏昏欲睡的是《孝义传》。传中共记了十四人，其中十一人无甚事迹，有的甚至只有五、六十字。几乎每个人都有“庐于墓侧，负土成坟”之语。此等史料大约是从家传或地方官请求朝廷旌表的例行公文中采录的。今天看来，这些都是《隋书》中的糟粕。

尽管如此，《隋书》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史书。它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隋朝三十八年间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科技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隋代社会的一部最主要的著作。

前人对《隋书》的整理都集中在“隋志”上。主要有清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九卷，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仅成史部十三卷）、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迄今为止，《隋书》还从未有过译注本。我们的《选译》，可以算是一个尝试。

《隋书》的通行本是一九七三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在“二十四史”中，这是点校得比较好的一种。它共采用了九种版本进行校勘，今天能见到的重要版本几乎都搜罗到了。校勘不主一家，择善而从。虽失古本之旧，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包容众长的新本子。这本《选译》的正文即依这个点校本。对某些失校的地方，我们作了必要的改正，同时出校记说明。而对某些标点欠妥之处则径加改动。所选各篇，一般是全文照录，但对高祖、炀帝二纪作了较多的删节，主要选取了有关二帝生平事迹的文字。列传中大段的诏令、奏书和附载的文章，也作了些删节，都用省略号标明。

我们的选目，主要根据两条原则确定：一是代表性，即选择那些在政治、军事、学术文化等某方面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二是可读性，即有一定的故事性、趣味性。因此，我们依据过去史书译法的惯例，舍弃了《隋书》的重要内容“十志”，而选录